

空海与袁晋卿

韩 昇

一、从《为藤真川举净丰启》说起

日本一代高僧空海聪慧博学，精于辞赋，擅长书法，一生写下许多诗文，由其弟子真济萃其精华，汇编为《遍照发挥性灵集》，成为传世佳作。

在《性灵集》第四卷里，有一篇《为藤真川举净丰启》，描述了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家族的活动事迹及其际遇，蕴含着空海对唐人的深厚感情，实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到日本的移民史的重要文献

这篇启文为骈俪体。我们知道，骈文兴行于南朝，至初唐四杰时盛极于世，上至制诰，下至表、启、檄、露布、序记、颂赞、祝祭和诰辞等正式文书，大都用骈文撰就。空海曾留学于唐，深受唐风熏染，所以在这篇启文里，他亦遵循唐规，采用骈体，身体力行地推广唐文化。由于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典故文彩，以夸示作者的才学功力，所以，今天读起来，颇有难懂之处，对于外国学者更是如此。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性灵集》里，对这篇启文的标点，除日本训读的特殊标点方法外，断句错误颇多，令人难以卒读。兹重作标点引录于下，既为方便后文的论述，也可作为日本学者参考纠谬。

真川等启，昧金照面，必待莹拂，童蒙开眼，定因师训。然则恩之重者，师德为最。如今故中务卿亲王之文学、正六位上净村宿祢净丰者，故从五位上、勋十一等晋卿之第九男也。父晋卿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遂乃位登五品，职践州牧。男息九人，任中而生。弘、秀两人，则任经中外，俸食判官，并皆降年短促，不幸而殒。最弟一身，孑然孤留，是则真川等受业之先生也。文雅陶心，廉贞养素，去延历中沐天恩于骏州录事，次迁亲王文学，忽遇罹时变，进仕途穷。今倏赖震宫之大造，朝参暮谒，年岁推移，欣厚过望。还叹薄命徒老，原宪之室，柴炭如金，孔伋之家，米莱似玉。既而风朝月夕，与饥蟬而绕悲，雪夜霜晨，将旅雁以多叹。至如冒雨涉泥，藜杖为马，戴星归舍，蔬餐支命，充庭黄口，无粒啄拾，巢里寒妇，珠泣向隅。每尚一忠于百君，还悲五尺之无容，悲哉！春雨荣林，新栽无蕊，秋风茂野，孤干未实。真川等润训有年，酬德无日，无势无力，空竭肝胆。伏惟相国阁下，帝宠伊霍，济物为心，天假仁慈，博爱是务，飞沈生其一眄，荣悴因其咳唾。伏愿贷恩波于涸鳞，赐德花乎穷翼，则汉语易咏，吴音谁难。敢抽愚款，烦黻簪珪，谨奉启不宣，谨启。弘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首先，我们对启文中的若干典故词语略作诠释。

1.震宫 《易经》震卦配当东方，为长男之象。故震宫即东宫、春宫。卢僎《上幸皇太子新院应制诗》云：“佳气晓葱葱，乾行入震宫”，即为此例。

2.原宪之室，柴炭如金 原宪，春秋时代鲁国人（或曰宋国人），字子思，为孔子的弟子。《庄子·让王》记载：“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

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纵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

‘嘻，先生何病？’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安贫乐道，是很有名的故事，常为古人所引述，如“原宪桑枢”、“原宪之蓬户”等。

3.孔伋之家，米菜似玉 孔伋，春秋时代鲁国人，孔子之孙，字子思，后世称之为“述圣”。唐李瀚《蒙求·孔伋缊袍》说：“《说苑》曰：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空海于此引用原宪与孔伋二例，描写净丰一家贫穷之极。

4.饥蝉 源于蝉腹，比喻饥饿，如“蝉腹龟肠”，见《南史·檀珪传》：“珪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曰：‘……蝉腹龟肠，为日已久，饥彪能吓，人遽与肉，饥骥不噬，谁为落毛。’”

5.旅雁 征雁，远飞的大雁。唐张均《岳阳晚景》：“晚景寒鸦集，秋风旅雁归。”

6.藜杖 古时“杖”与“杖”通，“藜杖”即“藜杖”。典出汤、禹辛劳治国的故事，《陈书·宣帝纪》载：“汤禹为君，藜杖韦带。”《新序·节士》载：“原宪冠桑叶冠，杖藜杖而应问。正冠则纓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

7.珠泣向隅 典出刘向《说苑·贵德》里的“向隅而泣”，为众所熟知。以上诸例，均用来渲染净丰家境贫窘，生活艰辛。

8.伊霍 即殷之伊尹和汉之霍光，古人常以此二人作为辅国贤相的象征。

9.涸鳞 典出《庄子·外物》，比喻处境十分困难的人。“涸辙鲋鱼”“涸辙之鲋”已是大家所熟知的成语。

10.簪珪 古代官吏佩带的瑞玉,用以尊称官人。

其次,我们再对启文辞句略作分析。

一、文中如“风朝日夕,与饥蝉而绕悲,雪夜霜晨,将旅雁以多叹”等,严格按照起句四字,次句六字的“正格”,属于第一和第三、第二和第四句对偶的隔句对。

二、“昧金照面,必待莹拂,童蒙开眼,定因师训”,“原宪之室,柴炭如金,孔伋之家,米粟似玉”,“冒雨涉泥,藜杖为马,戴星归舍,蔬餐支命”,“充庭黄口,无粒啄拾,巢里寒妇,珠泣向隅”,“春雨荣林,新栽无蕊,秋风茂野,孤干未实”,“帝宠伊霍,济物为心,天假仁慈,博爱是务”等,亦为隔句对。

三、“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文雅陶心,廉贞养素”,“每尚一忠于百君,还悲五尺之无容”,“润训有年,酬德无日”,“飞沈生其一眄,荣悴因其咳唾”,“贷恩波于涸鳞,赐德花乎穷翼”,“汉语易咏,吴音谁难”等,则属于上下两句对偶的直对。

四、“朝参暮谒”,“薄命徒老”等,则为句内对偶的单对。

从启文标题一目了然,这是篇空海替藤真川写的启。藤真川即藤原真川。藤原氏发祥于大化革新的功臣中臣镰足。此后,藤原一族权势倾朝,到其曾孙以后,日本政治更进入了“藤原专政”时代。可以说,藤原一族与日本古代贵族制相始终,是首屈一指的名门贵族。在唐文化尤如空气般弥漫于社会的时代里,日本的贵族们无不以“唐化”为标榜,于是,日本自称为“中华”,而藤原真川也改姓而成为藤真川了。这篇启文写作的弘仁七年(816),正是空海获准在高野山建立真言宗道场的年份,也就是他声名远播,事业走向鼎盛的时期。要请得动这位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为日本书法“三笔”的高僧写启,本身就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而且，如上分析，这篇启文也确实写得哀感顽艳，声韵格式、文辞典故，无不琢磨推敲，呕心沥血。空海一生替人写过不少表状，这篇启文能被选人《性灵集》，显非敷衍捉刀，而是得意之作。特别是出自一位外国僧人之手，虽其间声韵格律稍有不足，亦堪称上乘。看来空海是真心实意为净丰呼吁求援，惻隐之情，溢于文辞。

那么，这位由名门贵族藤真川出面、一代高僧空海撰启为之求助的净丰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何家世背景，作何贡献呢？

二、净村宿祢（清村宿祢）一族

说来奇怪，翻遍日本古代史籍，净丰此人，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幸赖空海为之撰写了出色的启文而留名于世。但在启文里，空海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两条重要的线索，这就是“净村宿祢”姓”（姓是日本古代氏族的氏名上所加的称号。古代大和政权根据豪族的社会地位和其世袭分掌的职务，相应地授予他们各种姓，建立起尊卑等级秩序，亦即“赐姓”）和“袁晋卿”一名。

查《新撰姓氏录》，在第三帙“左京诸蕃上”里记载着：“净村宿祢，出自陈袁涛涂也。”这条史料一直是个学界难题。“陈”字，日本学者均解释为国名，即指南朝的陈。但如后文所述，“净村宿祢”确是授予唐人袁晋卿的姓，所以我认为更有可能是地望，特别是出自名门大族者尤重地望。陈为古国，在今河南一带，与袁晋卿传授中原语音的事迹相符合。至于“袁涛涂”，更是无从稽考。我以为“涛涂”和“晋卿”有可能一为名，一为字。《颜氏家训·风操篇》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仪礼·士冠礼》的疏说：“君父之前称名，至于他人称字也，是敬其名也。”袁晋卿在日本名高望重，日本人称其字以敬重他，既合中国礼仪，也是可能的。而且，《新撰姓氏录》除林

本、中本、鹰本、上本和小本外，其余各写本“袁”字均作“表”字，可支持笔者的推测，同时也说明此条记载颇有脱漏。

第二条线索的“袁晋卿”，却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十二月条载：“庚寅，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于后历大学头、安房守。”在日语里，“清”与“净”音义皆通，故“清村宿祢”即“净村宿祢”。从这条材料可知，袁晋卿在中国时已熟习文学经典，到日本后，年未弱冠就已担任大学音博士，决非泛泛之辈。其赴日时间为天平七年（735），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并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时，所以当是应日本人之邀前往传授唐文化的。《续日本纪》是年三月条记载：“入唐大使从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广成等自唐国至，进节刀。”亦即袁晋卿随第九次遣唐使船来到日本。同行的有吉备真备、僧玄昉等日本著名人物，也许就是他们邀请袁晋卿的。有些日本学者以为这条史料没有唐人赴日的记载，所以怀疑袁晋卿或许是翌年到日本的，恰巧翌年有第十次遣唐使船回日，且《续日本纪》天平八年八月条载：“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人一人拜朝。”但据同年十月、十一月条的记载，这四位外国人分别是唐僧道睿、波罗门僧菩提、唐人皇甫东朝和波斯人李密翳。所以，在没有其它旁证的情况下，还是以尊重史料记载为是。

从现存史料里，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袁晋卿在日本的活动事迹。现整理如下表（史料见《续日本纪》）：

时间	到日后 年份	官 位	官 职	事 项
735		从七位上	大学音博士	应邀赴日时年十八九岁
766	31	从五位下	同 上	舍利会上演奏唐朝音乐
767	32	从五位上	同 上	
769	34	同 上	日向守	
778	43	同 上	玄蕃／大学头	赐姓清村宿祢。
785	50	同 上	安房守	

从上表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一、关于袁晋卿的官位。袁晋卿到达日本后最初担任大学音博士，查日本令制规定，大学音博士为从七位上，依此推算，从735~767的32年间，其官位依次经正七位下、上，从六位下、上，正六位下、上，从五位下，最后升至从五位上，共上升八级，平均四年升一级，此后未再提升，大约属于中上级官人。这主要是因为他基本上从事教育工作，已升到教职的最高位品。二、赐姓。袁晋卿获赐清村宿祢姓，在其到日本的43年之后。三、职务。在50余年的仕宦生涯中，约10年担任地方官，而担任大学教职竟长达41年，确是位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对传播唐文化贡献之巨，可想而知。

袁晋卿是清村宿祢一族的始祖，根据空海的启文，可知他有九个儿子，其中弘、秀二子先后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判官，但都英年早逝。判官是日本令制四等官的第三位官职，负责所任官司内的日常事务，属于中下级官人。最小的儿子，就是空海为之撰启

的净丰，自地方佐吏出身，后任伊予亲王的文学。伊予亲王任中务卿兼大宰帅，是亲王四品，故其文学的官位应是正八位，位阶不高，薪俸聊可度日。平城天皇时（806～809年）伊予亲王莫须有地被判图谋不轨，幽闭自尽。净丰也受牵连，禁锢在家，从此衣食无着，境况凄惨。

我们知道，空海原是明经科出身，18岁时就读于大学。按其生年774年计算，当在792年。此时袁晋卿早于七年前离开了大学，若还健在，也已是76岁的老人。所以空海不可能得列袁晋卿门墙，充其量不过是袁晋卿的再传弟子。尽管他完全可能得闻这位名高望重的老校长而景仰不已，但以其一介书生，当无缘拜见袁晋卿。所以，他为净丰撰启并非出自弟子知恩图报之情。在上述启文里，空海一再以原宪、孔伋等儒家圣贤比拟净丰，看来净丰亦非等闲之辈，他不仅是伊予亲王的文学，还是藤原真川等日本第一名门的家师，无疑是饱学之士，继承家学，颇有乃父遗风。可惜这样一位英年才子，家兄早逝，本人被宫廷阴谋所埋没，从此家道衰落，一蹶不振。

袁晋卿还有一位养子。《日本后纪》延历廿四年（805）十一月甲申条载：“左京人正七位下净村宿祢源言：父赐绿袁常照，以去天平宝字四年奉使入朝，幸沐恩渥，遂为皇民，其后不幸永背圣世。源等早为孤露，无复所恃。外祖父故从五位上净村宿祢晋卿养而为子。……伏请改姓名为春科宿祢道直。许之。”据此可知袁常照是奉使到日本的。案，天平宝字四年（760）未见有船来日，但翌年有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国。《续日本纪》是年八月甲子条载：“迎藤原河清使高元度等至自唐国。……（唐朝）即令中谒者谢时和押领元度等向苏州，与刺史李岾平章，造船一只长八丈，并差押水手官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鱼袋沈惟岳等九人，……送元度等归朝，于大宰府安置。”袁常照的所谓“奉使”，就是奉命送日本使者回国。其身分为“赐绿”，《旧唐书·

輿服志》记载：“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也就是唐朝的六、七品官。761年，中国正值安史之乱，哀鸿遍野。此送使一行官人，全都流落他乡，遂成移民。袁常照投依袁晋卿，娶晋卿女生源。这一支后改姓春科宿祢。

此外，清村宿祢一族尚有是岭一人。《续日本后纪》嘉祥三年（850）春正月丙戌条载：“诏授清村宿祢是岭……并外从五位下。”此人与袁晋卿的关系不详。

以上大致勾勒出教育世家清村宿祢一族的概貌，他们也可以说是唐朝到日本的移民的一个缩影。这时期的移民是在日本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建立起来后来到日本的。因此，他们与旧移民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通过移民集团的形式起作用，而是依靠个人的才能，在国家体制下为中日文化交流作贡献。

三、空海与袁晋卿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袁晋卿比空海大得多，根据上引史料，他大约生于716年，卒于805年以前至785年之间。而空海的生卒年为774~835年。两人的年龄相距近60岁，差不多属于祖孙辈。而且，如上所述，他们亦未谋面。然而，由于唐文化传播的主线把他们联系了起来。

袁晋卿到日本是为了教授日本人中原的语音，也就是唐朝的标准语音。从735~769年，他在大学里担任了34年的音博士。所谓音博士，就是向大学生教授汉语语音。我们知道，在隋朝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南朝文化”，特别是汉语的读法，基本上采用江南的语音，这就是有名的“吴音”。吴音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影响既深且巨，日本的吴音，许多是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传入的，至今日语里仍保留着不少吴音。僧文雄《三音正伪》中说：“窃按，乃昔之世，惟吴音之用。……本邦国名亦然，曰日本、曰萨摩、播摩、丰前、丰后、备前、备后、但马、

对马、美浓、伊豆、武藏，其从音者无一不依吴，……如古先帝号亦多从吴。其有汉者，后人为之，何者？延历之前靡有汉音，而杂之岂不后人所为邪。”正确指出了日本古代广泛使用吴音的情况。但他认为“延历（782~805）之前靡有汉音”，却不尽然。入隋以来，日本在文化导入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即输入中原文化。特别在白江口战败后，更是全面模仿唐制，建立起律令体制。这样一来便发生了江南语音和中原典籍之间的矛盾障碍。于是日本政府就着手用中原语音去统一汉语的读音，这就是所谓的“唐音”、“汉音”。在律令制下确立大学寮制度时，就在大学寮设立音博士一职，定员二人，聘请唐人担任。最初见到的音博士是唐灭百济时被百济俘虏并转赠日本的唐人续守言和萨弘恪。《日本书纪》持统纪载：“赐音博士大唐续纪言、萨弘恪等稻各有差”，其时在691年9月。从那时起至延历年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唐音，奈良时代甚至屡次强制顽固坚持吴音的僧侣用唐音读经。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唐音成为日语中汉字读音的主流。当然，这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所以很难说“延历之前靡有汉音。”

语音是语言的基础，而语言本身则既是文化，又是创造文化的工具和传播文化的媒体。脱离了语言，则文化的传播便无从谈起，此其一。袁晋卿赴日的年代，正是日本由南朝文化向中原文化，由吴音向唐音巨大转换的时代，如上引空海撰的《空海文集》及此时期日本人的作品所见，日本人对汉语的娴熟运用，若非得益于上述转变，实难想象。没有对汉语的深切理解，那么汉文学的创作乃至唐制的模仿均非易事，此其二。

其三，灿烂的唐文化的风靡，给日本社会极大的冲击，左右了其文化的取向，这在导向文化的大学寮里可以得到典型的反映。日本的大学寮隶属于中央八省之一的式部省，它既模仿唐朝的学制，又不尽相同。唐中央设国子监，统辖国子、大学、四门

及律、书、算等六学，六学里分别设各类博士、助教，招收学生。而日本的大学寮虽说相当于唐的国子监，是最高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它同时又把学校纳入其中，成为最高的学府。

隋文帝开皇年间设立的进士科以及其后的发展，引导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日益注重文辞。这种文化发展的取向，同样给日本很大影响。日本的大学寮原以经学为本科，占据中心地位，其余各科均附属于此，以后各科逐渐分立。受唐文化潮流左右，日本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日益倾心于唐代的文学，遂开放出天平文化的绚丽花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728年大学寮设置文章博士，后年，定员文章生20人，成立了文章道，教授文史，文学终于从经学之下解放了出来，并日益兴盛。到820年，文章博士一举从正七位下跃升为从五位下，凌驾于明经博士之上，犹如唐代进士科一枝独秀。文学是语言的结晶和享受，它的蓬勃发展，势必推动音律、音韵、文辞和修饰学的发达。袁晋卿由音博士升任大学头，正反映了文化风气转变下对语言文学的重视，也是对他数十年通过教授唐音、传播唐文化以促成上述文化风气转变的巨大功绩的酬答。

概言之，袁晋卿是在日本于文化的各个方面由江南文化向统一的隋唐文化切换的时代来到日本，以其教育家默默无闻的辛劳奉献潜移默化地促成这一转变的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活跃的时期差不多都与奈良时代相等。如果说奈良时代是日本唐文化繁荣的时期，那么，接下来的平安时代则是唐文化吸收融合形成日本古代贵族文化繁荣的时代。比袁晋卿小近60岁的空海，其事业正昌盛于平安初期。

空海原是大学明经科出身，年轻时接触到佛典，为之倾倒，遂立志于佛学。他跋涉山川，求寂静之境精修练行。著《三教指归》三卷，阐述佛教优于道教与儒学，不啻是投身佛教的宣言。804年，他奉桓武天皇特旨，随遣唐使入唐留学。两年间，他历

访各地诸寺，特别是在长安青龙寺拜中国真言正统第七祖惠果为师，得受金刚界大悲胎藏两部大法，同时又从般若三藏等人受学《悉曇》，决定了其日后的发展。806年，空海携带许多经典书籍、佛像法具回国，开创了日本的密教真言宗。

空海所处的时代，是唐文化繁荣与日本古代贵族文化逐渐开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的佛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佛教由单纯的移植向吸收消化的转变。佛教最初传入日本，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关于现世祈祷的一部分，人们并不是从经文里吸取哲学思想，而是企图通过读写经文和崇拜偶像来获得灵验，其性质完全是现世宗教，并作为国家统一思想的工具发挥作用。奈良时代的南都六宗（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和律宗），是在这种佛教的社会基础上从中国移植而来的教派，仍保持着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佛教性质，看不出有什么佛教思想体系上的建树。到了最澄和空海传人的天台宗和真言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给日本的佛教界吹入清新的空气。特别是空海对密教的吸收与消化，使这一在体系和形态上难以独立成宗的教派首次独立成为真言宗，并与最澄建立的天台宗一起奠定了日本佛教的思想与理论体系。

第二个变化表现为佛教由印度宗向中国宗的转变。在南都六宗里，称得上是中国宗的只有华严宗一支。但这一宗的教徒致力于把教旨应用到现实社会中，而在教义上甚少发展。所以，总的来说，奈良时代仍是印度宗的时代，到最澄与空海建立天台与真言宗以后，才确立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

第三，释迦佛的一代教法，不外乎经、律、论三藏。以往的教派是在论藏或律藏的基础上开宗立派的，只有最澄和空海才真正依据经藏建立宗派，开创了平安佛教的新局面。

第四，空海在日本佛教界确立了密教的地位。中国的密教始于东晋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的《大灌顶神咒经》。但在唐开元间善

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藏传入体系性的“纯密”以前的密教，都属于“杂密”。在空海之前入唐求法僧和到日本传教的中国僧人也都曾陆续传入一些密教，但他们都不是以密教为专业。譬如最澄，他虽曾向顺晓学过密教，并在其开创的天台宗里融入密教，但他传入的密教属于胎藏系统，比“杂密”的水准高不了多少。只有空海专门向中国密教大师惠果学习密教，得到正统秘诀，回国后创立了第一个密教宗派——真言宗。更重要的是空海为密教作了教相判释，说明了佛教对密教的关系，指出整个佛教的终极妙义在于密教。此后密教大盛。当时日本的佛教，无论新旧教派几乎都根据密教加以变革，完成了显教向密教的转变。

综上所述，空海是一位在日本佛教史上继往开来的大师，是平安文化的先驱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海不仅是一位大德高僧，同时还是热心的教育家。他创办了一所名为“综艺种智院”的私立学校，招收不能进大学和国学的学子，教授儒家和佛教的经典，以普及教育。

因为有过从事教育事业的经历，空海深深懂得教书育人的伟大意义，体会教师的辛苦，尊师重道。这是他景仰袁晋卿，同情净丰的一个重要原因。留学唐朝的经历，使他能够理解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艰难，而在唐朝蒙受师恩，更使他对中国人怀抱深厚的感情，这一切都驱使他饱含深情地为身罹冤屈的净丰撰启求助。而且，他和袁晋卿都是在文化上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难免有英雄相惜之情。空海为净丰撰启，遂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袁晋卿和空海，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日本人，他们都曾跨越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的足迹。如果说袁晋卿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促进了日本由江南文化向隋唐文化的转变，为天平文化的开花浇注心血，那么，空海则是通过建立密教真言宗吸收融化唐文化，开创佛教的新局面，推动了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的繁荣。他们两人都身处文化转变的时

代，一前一后相继出现，共同推动日本文化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

诚然，这两位伟人在文化上都没有太大的独立开创性，但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是文化传播、吸收和消化过程中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任何文化的创造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决不亚于开创者。况且他们的事业规定了此后的文化发展。唐文化的生根开花，规定了以后日本文化发展的方向；空海极力传播的即身成佛说，是镰仓时代民众佛教兴起的源头。即使从今天的角度去看袁晋卿和空海，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们是超越时空的新文化先驱者。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

白居易“湖上春行”佚诗一首

《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四“湖”字韵载白居易“湖上春行”诗二首。其一“孤山寺北古亭西”见《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版。按：此书晚出，收白诗较全）卷二十及《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三“钱塘湖春行”。除诗题不同外，“贾亭”、“暖树”《大典》作“古亭”、“暖曙”。其二：“湖上春来古画图，群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北湖。”此诗《白居易集笺校》及《全唐诗》《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均未收。

• 童根羽 •